



中国国情丛书——百县市经济社会追踪调查·儋州·洋浦卷

琼西崛起的双子星座

The Rising Gemini
in West Hainan



—
主
编
廖
逊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中国国情丛书——百县市经济社会追踪调查·儋州·洋浦卷

琼西崛起的双子星座

The Rising Gemini
in West Hainan



-88

F127.664

U474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儋州·洋浦 政区示意图





儋州农村一瞥



儋州天正造船厂 洋浦千年古盐田

儋州永航不锈钢厂





儋州汽车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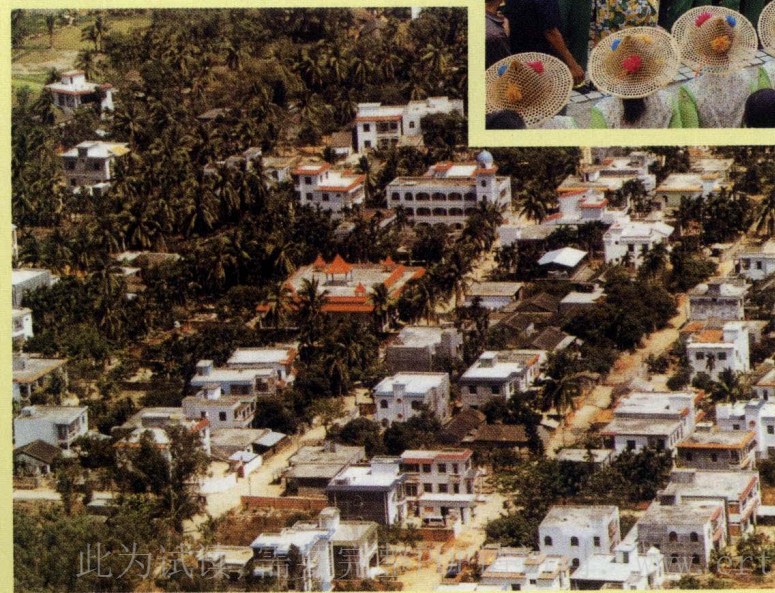


儋州长坡瓜菜



洋浦浦苑小区

中秋文化周儋州调声活动



儋州农民新居



中国百县市调查丛书总编辑委员会

名誉主编 丁伟志 陆学艺

主 编 何秉孟 黄浩涛

副主编 牛凤瑞 谢曙光

秘书长 谢曙光

副秘书长 何 丽 丁 凡

编 委 (待后增补,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爱丽 韦 伟 水延凯 曲 伟

吕芳文 刘景华 孙自铎 孙兆文

杜受祜 李友清 张 明 张卓民

格 勒 黄陵东 曹晓峰 廖 逊

魏胜文

《儋州·洋浦卷》编辑委员会

主 任 丁尚清 廖 逊

顾 问 柳树滋

副 主 任 张 琦 罗时祥 郭全茂 樊明亮
林星煌 夏鲁平 王琼兰

委 员 (按姓氏笔画为序)

丁尚清 于苏光 王琼兰 刘光前
岑选星 张 琦 林芳兰 林星煌
罗时祥 柳树滋 夏周青 夏鲁平
高 萍 郭全茂 郭晓帆 廖 逊
樊明亮

主 编 廖 逊

副 主 编 夏鲁平 (常务副主编) 王琼兰

总 序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历史性演变：正在由一个传统的、封闭的农业农村社会转变为工业化、开放的城市化的现代社会。我国的改革开放大业，是一场占世界人口1/5强的13亿人民的进步运动，已经改变了中国的面貌，还在进一步发展变化之中，影响及于世界，她是20世纪后期世界发生的最重要、意义最深远的大事之一。

伟大的变革，一定会有科学的总结。对于改革开放以来的这场大变革，应该做深入的研究和总结。她是怎样发生的？是怎样发展变化的？经历了哪些中间环节和中间过程？有哪些基本经验？有哪些要吸取的教训？未来将怎样演变和发展？还有哪些重大问题要解决等。所有这些，不仅是中国人民普遍关注的大问题，而且也是世界各国人民关注的大问题。这样的总结，当然首先应该由当代中国人自己来做，因为这是发生在自己身边的事情，有亲身的经历和亲身的体会。

一场伟大而深刻的历史变革，影响广大而深远，会有各种各样的总结。既有当代人从不同的立场、观点和不同的要求、视角的总结，也会有后代人的各种总结。中国人有总结历史的好传统，“温故而知新”是我们的格言。所以，后代人的总结，虽然可能比较简约，但常会有更加全面、更加深刻的佳作，给人以新的启迪和警示。

中国的改革开放大业还在继续，中国的经济社会结构大变迁还在继续。原有的社会矛盾解决了或基本解决了，新的社会矛盾产生了或正在产生，中国的新的历史长卷正在按照规律一步一步地展示。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外的人们对中国这场巨变已经做了很多总结，有的是很有见地的，有的则是浮光掠影地描述或者只是个人的臆测和猜想，这是难免的。因为变革本身还在演变之中，有许多不确定因素，加上体制等方面的原因，一些变革的真正原因、重大改革和重大事件的决策真相，还没有公示。所以，真实、全面深刻的总结还要有待于未来。



伟大的变革，是亿万群众亲身参加的变革，总结本身也应该是群众的事业。人们可以从不同的方面、不同的角度、不同的阶段，用不同的形式作出各种不同的总结。一旦条件和时机成熟，集腋成裘、集其大成，真实全面深刻的总结就诞生了。在当前，我们应该为中国这场伟大的变革作好各方面的准备，其中有一项工作很重要，那就是通过实地调查研究，采用各种形式，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变化情况、变化过程，如实地记载下来。中国的这场巨变，可以说是自周秦以来，经济社会结构发生最巨大、最深刻的一次演变，不仅是经济基础、社会结构变了，上层建筑也变了；农村变了，城市也变了；生产方式变了，生活方式也变了；家庭婚姻变了，社会心理、价值观念也变了。而且这些变化非常迅速，转瞬即逝。有的农村，几个月工夫，整村整屯地不见了。有的地方，几年工夫就冒出来一个很大的城市。就是住在北京市的人，几个月不出门，再到原来很熟悉的社区去看，有的四合院不见了，幢幢大楼矗立起来了，连路也不认识了。我们这一代人，有责任通过各种调查方法和形式，将这个巨大的变化从各个侧面把它记载下来，越具体、越详细、越真实越好。这些调查记录，不仅对研究中国的经济学、社会学有意义，而且对政治学、历史学、哲学等学科的发展也有意义。从学术的角度看调查分析，不仅对当代有价值，而且对后代更有用。年代越久，越珍贵。这可以说，这是对中国这场巨大变迁作出科学总结的学术准备，也是最重要的基础工作。

1988年，为了贯彻落实邓小平同志关于“摸准、摸清”中国国情的指示，拓宽、深化对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认识，在党中央有关部门的指示下，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会的大力支持下，中国社会科学院开始组织实施了“中国百县市经济社会调查”，这是一项全面系统的综合性调查。从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中选定了100余个不同区域类型，不同发展程度，具有代表性的市（县）区作为调查对象。调查的内容是自1949年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这些县市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的演变过程和状况。调查的形式和方法是，组织专业调查人员到这个县市蹲点，同当地的干部群众相结合，广泛收集大量的数据和文献资料，召开各种座谈会，听取县市各级干部、群众的介绍，并且坚持下厂下乡，走村串户，作抽样问卷调查，对各个阶层、各类人员进行深入访谈，下大工夫掌握第一手资料，按照“真实、准确、全面、深刻”的八字方针，进行分析研究，写出反映这个县市全貌和历史演变过程的调查研究成果。本项大规模国情调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进行的少数几次大规模经济社会调查之一，是一次浩大的



调查系统工程，先后有近 3000 名社会科学专业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参加，动员了数以万计的干部群众协助，取得的数据资料数以亿计，最终成果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以《中国国情丛书——百县市经济社会调查》为书名，自 1991 年起陆续出版，到 1998 年 10 月出齐，共 104 卷，4000 多万字。经总编委和国情丛书编辑部评议和协商，从中减去 4 卷，最后送交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会作为最终成果的是 100 卷。前后历时 10 年 8 个月，完成了预定的计划。

这 100 卷国情丛书，每一卷都是以描述一个市（县）区的历史和现实发展状况为主的学术资料性专著，它既是各级政府制定经济社会政策和发展战略的依据，也是进行基本国情研究或社会科学专题研究的基础资料，具有重要的实用价值和较高的学术价值。这套国情丛书，真实地记录描述了分布在全国 31 个省、市、自治区的各种类型、各种发展水平、有代表性的县市的历史演变的轨迹，这些资料和数据来之不易，十分珍贵，所以这套国情丛书也具有重要的保存价值，历时愈久远，其价值愈珍贵。因为它是对 20 世纪 80 ~ 90 年代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生的伟大变革的真实记录，是对这场伟大变革做出科学总结的基础性学术资料。所以，这套国情丛书一出版，就受到了国内外学术界的欢迎，认为这是社会科学界的一项很重要的学术资料基本建设的成果。这套国情丛书已成为国内外各大学和学术科研单位的图书馆的藏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会对本项成果给予了高度评价，公开予以表彰，中国社会科学院给本丛书颁发了科研成果特别荣誉奖。

从 1991 年出版第一批国情丛书（调查内容是 1988 ~ 1990 年间的），距今已十多年。这十多年来，恰是中国经济社会变化最大的时期，邓小平同志的南方谈话、党的“十四大”明确指出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国有企业改革、乡镇企业改制、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第八、第九、第十个五年计划的顺利完成；综合国力有了极大的增强，胜利实施了现代化建设“三步”战略的第一步、第二步目标，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这十多年是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改革和发展最快的时期。鉴于此，国情丛书总编委认为有必要在第一次百县市国情调查的基础上，从中选择部分县市作一次追踪调查，作深入翔实的比较研究，这有利于我们准确把握 21 世纪初期的中国国情。为此，总编委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会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提出了申请报告。2003 年春，国家社会科学规划办正式批准《中国百县市经济社会追踪调查》课题，并将其定为国家社科基金“十五”重点课题。随后中国社会科学院也批准本课题的立项，给予了重点资助。《中国百县市经济社会追踪调查》课题立项后，第一批五个调查试点已于 2004



年初启动，同年8月又部署了十余个县市调查点，整个追踪调查计划到2007年完成。本次追踪调查的内容，强调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着重反映这十多年来在改革开放、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经济社会发展所取得的成就和面临的问题，既要同上次调查内容衔接，作出相应的比较，探讨发展变化的内在规律，也要有新的拓展，对改革发展中出现的新事物、新领域、新问题，要充分予以反映。

本次追踪调查的方针，仍要始终坚持贯彻“真实、准确、全面、深刻”的八字方针。实践证明，这个方针是正确的，保证了中国百县市经济社会调查这项大规模调查众多人员的认识和步调一致，保证了最终成果的质量。

本次追踪调查的成果，定位为资料性和研究性相结合的学术专著。在全面深入调查，掌握大量第一手资料和数据的基础上，进行综合分析，与上次成果作比较研究，总结出一些规律性认识，写出具有科学研究价值、实用价值和保存价值的专著。最终形成的成果，将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所属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从2005年起陆续出版。

本次追踪调查，是继中国百县市经济社会调查后的又一次大规模的社会调查，意义重大，难度也很大。既要有参与此项工作的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敬业奉献精神，尽心尽力，又一定要有被调查县市的领导和各级干部、广大群众的大力支持和参与，群策群力，才能完成。我们虽然有了组织实施上次调查的实践，但是新的历史环境、新的条件下，要完成这项新任务，还要解决好一系列新的难题。我们竭诚欢迎社会各界、广大读者不吝赐教，提出各种批评和意见，帮助我们在这项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的事情办好。

陆学艺

2005年8月28日



是金子总要发光（代序）

——洋浦开发启示录

1993年3月国务院正式批准设立洋浦经济开发区，自此洋浦行政归属上从儋州划分开来，到今天已经16年了。1996年由中共海南省委党校牵头的课题组完成中国百县市经济社会调查《中国国情丛书——百县市经济社会调查·儋州卷》的时候，洋浦经济开发区只在该书第十六章经济开发区中被单独列为一节，字数不足6000字，就像襁褓中的一个婴儿。今天再写《中国国情丛书——百县市经济社会追踪调查·儋州（洋浦）卷》时，洋浦却已独立成编，长成翩翩少年。16年筚路蓝缕，16年坎坷奋斗，当年的一张草图已然变成现实，粗具规模的重化工基地在昔日不毛之地崛起，2007年开发区的工业总产值竟然占到了全省的38.5%，进出口贸易总额则占到58.8%，全区的地区生产总值为74.2亿元，人均17.18万元，相当于全省平均水平的11.8倍。

当年吸引过全国目光的洋浦如何走过这段岁月，洋浦和儋州如何相伴成长、相互提携、共创辉煌，个中的教训、经验与启示值得一说。

一 发现洋浦（20世纪70年代）

海南岛四面环海，海岸线绵延1500多公里，拥有68个天然港湾，却“极乏良港”。陈植先生在1949年出版的《海南岛新志》一书中说：“海南岛四面环海……唯天然良港，并不甚多，有之，唯榆林（南部）、清澜（东部）、马袅（北部）、新英（西部）、海口（北部）等数处港口而已。”王翔翻译的《棕榈之岛》一书中对于海口港的评价则是：“这个港湾在退潮时恐怕是世界上最糟的。”

20世纪40年代日本占领海南岛时期，曾经对八所和榆林两个港口进行了建设，结果最大的八所港建成之后也不过有了5000吨级的泊位。直到1958年经过扩建，才有两个万吨级泊位，但是退潮之时重载的万吨货轮还是无法进港。



严格地说，洋浦良港是70年代才被发现。根据当时周恩来总理在全国建设200个万吨级泊位的指示，1974年交通部开始了对洋浦港的勘察，并在1984年和1986年相继完成了《洋浦港口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和《洋浦港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

人们这时才惊喜地发现，海南竟然还有一个“中国少有世界难得的天然良港”洋浦，这里具有发展新型临海工业的诸多优势：一是港口，洋浦半岛深水岸线有60多公里，水深一般在10~30米，可建1万~30万吨码头80多个。而且基本不淤，无须每年疏浚。二是区位，处在中国与东南亚海运主航线的中心位置。三是资源，洋浦近海有丰富的石油天然气资源，周边有石英砂等矿产资源。四是土地，洋浦半岛腹地开阔，人口稀少，土地贫瘠，岩石基底，最适合工业发展。

洋浦前景可观，是否马上开发却众说纷纭。1975年，海南行署提议建设洋浦港并且成立了筹备组，从广州和上海等地邀请一批专家进行可行性研究，他们都认为海南岛没有多少东西可运，国家财力也不足，搁置了那个提议。1983年6月，海南行署成立了洋浦港筹建办公室，由于资金短缺，筹备工作停滞不前。同年8月，交通部派人研究建设洋浦港问题，再次认为岛内无多少东西可运而否定之。

转机终于出现。1986年2月，当时的国务院总理视察洋浦，提出“洋浦港很有前途，要好好规划，好好建设，三五年或者十年八年内，这地方要搞成一个现代化的港口城市”。有了总理的支持，1987年交通部投资1.8亿元，开始洋浦港一期工程，即在这里建设3个2万吨级码头和1个3000吨级工作码头以及60公里的高标准疏港公路。

二 得意文章（1987~1988年）

许士杰是海南的首任省委书记，曾对自己的秘书说，引进外资成片开发洋浦，是自己“辛辛苦苦、深思熟虑构思的一篇最为得意的文章”。

20世纪60年代许士杰在海南行署担任副书记，1988年受命主政海南，已经68岁的他满怀豪情再次上岛。有一个故事可以佐证。1988年4月13日全国七届人大一次会议上，通过《关于设立海南省的议案》之时，2836票支持，2票弃权，还有1票是反对。散会以后在广东代表团汽车上许士杰愤愤不平地说道，海南建省如此好事，怎么还有人反对？一个代表笑着说：“反对票是我投的，海南要离开广东，我舍不得呀。”许士杰听罢莞尔一笑，随



即说：“你放心，我们会把海南建设好的。”此时的许士杰已经胸有成竹，他当然知道海南岛的经济基础还十分薄弱，完成赶超发达地区的任务困难重重，不过，实现超高速的发展必须有超常规的思路，那就是更大的开放，更勇敢的创新。他在年前海口召开的琼崖纵队建立60周年纪念会上即席朗诵的那首诗中已经披露了这个心迹：

琼崖儿女展雄风，揽月摩星上碧空，
冲破小笼翱四海，扶摇万里作征鸿。

从1987年筹备建省的时候开始，许书记最多的一个话题，就是如何认识海南、建设海南。他认为，海南与深圳、珠海等特区不同。说海南有地理优势，是相对于更适合大开放来说的，若论和香港、澳门的距离，深圳、珠海、珠江三角洲比海南优势大，三来一补项目，人家愿在那里搞，不会舍近求远到海南来。深圳开始办特区，各方面都给开绿灯，而海南办特区一开始就比别人慢了好几拍，国家又不可能给大的投资，基础差、底子薄、起点低却目标高的矛盾特别突出。要想把海南特区搞上去，非得寻找大规模引进外资和台港澳资金的新路子不可。

洋浦开发区的设想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经过许士杰的亲自游说，熊谷组（香港）有限公司于元平老先生同意在洋浦搞个30平方公里的开发区，从基础开发搞起。谈判、探讨正在进行，各种议论就接连不断地传来，有充分肯定、热情支持的，有原则肯定、具体否定的，更多的是有疑虑、有担心，一是疑虑熊谷组炒地皮，不上项目；二是担心地价低，农民接受不了；三是疑虑主权转移。

那一段日子里，许书记每天少言寡语，陷入深深的沉思，有时闭门谢客，关起门来翻阅文件、资料。一次他把秘书叫进去，“你说主权的标志是什么？”秘书知道他这样问一定是有了明确的观点需要阐述，就默默地坐在那里等下文。果然他继续说下去：“洋浦开发区要按照省政府的统一规划搞，行政、公安、税务、邮政、公路、码头都在政府的有效管理之内，主权在我不必顾虑。”他又说，“洋浦那个地方，是三多三少，石头多、仙人掌多、荒地多，水少、林木少、村庄少。那地方已经沉睡了几千年，难道还让它继续沉睡下去吗？什么叫炒地皮？谁有本事到那荒凉的地方炒炒看看，连起码的地产常识都不懂。没有投入哪来的产出？荒地基础开发，每平方公里至少要投入1亿~2亿元人民币，30平方公里是多少？我们拿不出那么多



资金往荒地里投，还不愿别人来投，没道理。根本不用担心人家不上项目，不上项目人家怎么回收资金？天下没这样的傻子，投下巨资搞三通一平而不上项目。至于农民的工作嘛，关键在统一干部的思想认识。”许书记越说越兴奋，一扫这几天的沉默。显然，经过反复思考，他看准了，心里有数了。这天中午，他特地带了一瓶酒到小餐厅，和一起在那里就餐的其他领导同志们干杯。

一天傍晚，华海公司一位负责人来向许书记反映。儋县领导和熊谷组在地价问题上谈不拢，熊谷组的人已经走了。第二天许书记就驱车赶到县里，和县里一班人坐下来开会。他没有恼怒，没有批评，和平日一样温文尔雅，胸有成竹。他拿起小本子，认真记录县领导们的意见，问题集中到一点——地价，熊谷组方面坚持2000元一亩地，县里认为这个太低，农民不好接受。许书记听完县里的意见，又详细问了洋浦30平方公里内有多少可耕地、青苗、树木和村庄，之后，为县里领导算了一笔账：他从农民的现有收益到土地出让及开发起来后的收益算起，从县里目前状况算到洋浦开发后可能得到的带动性发展，从儋县一个县的发展算到周围邻近县可能的获益，从一个洋浦地区的崛起算到全海岛的开放与开发，没有摆大道理，没有说教，都是人情入理，实事求是。他的话讲完了，县领导们从聚精会神的记录状态中抬起头。从表情上看得出，大家想通了。书记和县长表示，要层层向下算笔账，相信会算通的。时隔不久，熊谷组和县里又重新坐到谈判桌旁，签订意向书，缴下土地预订金。后来在洋浦风波中，儋县的广大干部群众从未动摇过，与这次细致的“算账”不无关系。

从儋县回来后，许书记在各种场合反复讲开发洋浦的意义：成片开发是根据海南特区实际确定的发展路子，而洋浦开发则是成片开发的重点和示范区，是为特区发展开拓一条如何“引鸟筑巢”，搞成片开发的新路子。

在以许士杰书记为首的海南省委、省政府的积极努力下，1988年6月熊谷组（香港）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兼总经理于元平率专家实地考察洋浦，短短4个月之后的10月16日，《海南洋浦地区30平方公里土地使用权有偿出让协议书》即在海口签署。海南省政府同意由熊谷组（香港）有限公司利用受让的30平方公里的土地投资兴建开发区的基础设施，形成工业用地和其他建设用地条件，并且按照有关政策引进工业项目。熊谷组提出，将在15年内分三期投入180亿港元进行开发区的基础设施建设。与此同时，通过招商在其中兴建年产45万吨乙烯联合企业、52万吨尿素厂、300万吨炼油厂、300万标准箱玻璃厂以及钛白粉厂，预计总投资又是50亿美元。



1988年12月8日，海南省政府正式上报国务院《关于引进外资成片开发洋浦的请示》。

三 遭遇“寒流”（1989年3月~1992年3月）

1989年早春，许士杰的“得意文章”遭遇寒流。

3月25日下午，政协七届二次会议最后一次大会发言，有5位政协委员突然提出“海南拟将洋浦港中心地区大片土地出租给日本企业”，导致“可能出现新的租借地，人们不能接受。海南省的做法如成为事实，一定会损害我国的主权，令人十分忧虑。”“我国即将收回香港、澳门，从此中国人民一个半世纪的国耻将得以彻底清洗。但现在海南省领导却又要将本土大片连块土地租借给外国企业，我中华民族之尊严将何以维持。”这个发言因为安排在最后，也就没有了海南代表的申辩时间。舆论出现了一边倒。

此后，100多位政协委员签名上书国务院，要求制止海南引进外资开发洋浦的行为。被莫名其妙地扣上了这样的政治帽子，海南的同志当然不服气。4月25日，在海南省人大一届二次会议上，许士杰激动地说：“引进外资开发洋浦，我们在经济上没有风险，但是政治上要冒风险，大概不会挨棍子，但帽子可能不会少，最吓人的帽子无非是卖国。为了改革开放，我们不怕戴帽子，想保险，就关起门睡大觉，优哉游哉，让荒地继续荒芜，继续长仙人掌，但仙人掌不能当饭吃……”

风波发生才一个月，“总设计师”出面为海南说话了。4月28日，邓小平对于洋浦问题做出批示：“我最近了解情况后，认为海南省委的决策是正确的，机会难得，不宜拖延。但须向党外不同意见讲清楚，手续要迅速周全。”但是，在各种力量的影响下，洋浦的开发还是暂时被搁置了。此时，许士杰已经因病离开了海南省委书记的职位，住进了广州的医院。在住院的14个月里，他没少议论过洋浦的事情，和他的秘书，和来探望他的同事与战友，和海南的同志。在许士杰病房的墙上，赫然挂着吴南生同志（时任广东省政协主席）书写的他的诗作《洋浦风波诗六首》：

1. 有感

开发力筹邓氏钱，云山远隔是非颠。

外资才引飞奇帽，君住桃源不辨年。



2. 有寄

有偿出让变租界，兄脑细思话热昏。
烟火远离人入定，怎知室外有风云。

3. 有别

商业行为世既然，主权国耻怎沾边？
马牛不及惊蛇形，黄历岂能说当年。

4. 有辨

繁华闹市寸金地，海角荒芜乱石坡。
谬以厘毫当尺寸，无知偏见废言多。

5. 有情

洋浦风波掀巨浪，惹来中外共关怀。
石头荆棘成珍宝，人面桃花处处开。

6. 有为

蓝图已绘历今朝，京阙劲风助幼苗。
勤灌细栽察气候，从来历史笑观潮。

曾经被广州市民高票推举为全市十大公仆之首的许士杰，一生政治生涯的最后一站却是海南，而对洋浦更是情有独钟。他从洋浦带回的一棵仙人掌，就养在广州自家的庭院里，“勤灌细栽”，每次回到家里，都要细细观赏一番。他最后的遗愿也是“想回海南特别是洋浦看看”。可惜直到1991年7月去世之时，老书记也没有等来洋浦开发获得批准的消息。

四 11年坎坷（1992~2003年）

1992年3月9日，国务院终于批准海南省吸引外商开发洋浦地区30平方公里土地建设洋浦经济开发区。消息传出，洋浦人奔走相告，13日晚上洋浦开发的消息在中央电视台播出，14日早晨六七点钟，民众就放起庆贺的爆竹，镇上的人们奔走相告，敲锣打鼓以示庆贺，犹如过年一般。同年9月9日，洋浦开发区封关运作，目标是建设一个类似香港的全面开放的自由港。

1993年12月中旬，在洋浦登记注册的企业已经超过5500家，其中外资企业250家，注册资本1000万元以上的197家。注册企业总计注册资金为人民币87.47亿元，港币47.7亿元。但是，实际开业经营的企业仅为150家。

熊谷组是真干的。到1995年底，洋浦开发区仅基础设施的投资就达36